

公共资源和企业边界的经济治理之道 ——200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

郭其友¹, 李宝良²

(1.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首先概述性地介绍了 200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学术生涯及其主要的学术著作, 然后分别详细评述了奥斯特罗姆在公共资源经济治理方面和威廉姆森在企业边界经济治理方面的重要学术贡献, 最后分析了经济治理理论对反思当前金融危机和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奥斯特罗姆; 威廉姆森; 经济治理; 公共资源; 企业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50(2009)11-0011-09

一、引 言

经济学研究源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相对稀缺的资源 and 人们无穷的欲望导致了人类为了获得各种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冲突与合作。为了解决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以避免人类陷入“丛林社会”的困境(霍布斯, 1651), 或者为了更好地实现合作的收益, 人们或自发或有意识地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秩序和制度安排, 包括国家、市场、企业、家庭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模式。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市场制度, 而较少关注其他非市场制度安排。随着 1937 年科斯《企业的性质》论文的发表, 人们意识到市场只是组织经济交易的一种方式, 经济交易不仅仅发生在市场上, 而且还发生在其他社会组织(如企业、协会、家庭和其他机构)内部。这些非市场制度安排的性质及其在组织交易时的效率就成为经济学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由此构成了经济治理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经济治理分析的目的在于探讨政府、市场和层级结构等各种可供选择的组织模式的性质及其经济效率背后的逻辑, 以寻找良好的秩序和可行的制度安排(威廉姆森, 2005)。

瑞典皇家科学院 10 月 12 日宣布将 200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以表彰他们对经济治理分析的研究, 其中奥斯特罗姆侧重于研究公共资源的治理之道, 而威廉姆森则侧重于企业边界的治理分析。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称, 奥斯特罗姆证实了使用者协会如何成功地管理公共资源, 而威廉姆森则发展了一套以企业作为冲突解决构架的理论, 他们的这些开创性贡献把经济治理研究从经济学关注的边缘推到了前沿, 同时表明了经济分析可以清楚地解释大多数社会组织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奥斯特罗姆是 1968 年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她的获奖出乎人们的

收稿日期: 2009-10-29

作者简介: 郭其友(1963-), 男,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

李宝良(1980-), 男,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意料,首先她打破了男性经济学家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垄断,其次她的著作更大程度上属于政治学而非经济学的范畴。与此相比,威廉姆森的获奖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在新制度经济学崛起中居功至伟。不过,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来看,奥斯特罗姆是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之一,而威廉姆森则是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们都是非市场经济制度研究的领军人物。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大学派的学术巨匠,开创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先河。

二、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生平及主要著作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都有着不凡的履历和丰富的著作。本节概述性地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及主要著作。

(一) 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主要著作

奥斯特罗姆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她创立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已经被公认为美国公共选择研究的三大学派之一。奥斯特罗姆现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席教授,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合主任,公共事务和环境事务兼职教授以及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并且还担任过多个学术团体的主席和顾问委员。

奥斯特罗姆 1933 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成长在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代。高中毕业后,她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主修政治学。1954 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波士顿一家法律公司做了三年的人事经理助理。之后,她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公共管理,其博士学位论文以南加州的水资源管理问题为题。实际上,这一博士论文选题有其现实的背景。1945 年,南加州一个主要的地下水盆地打出来的水质量下降,过度的地下水开采导致海水入侵。一些人组成了水资源协会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提出了一套新的规则,建立了淡水补给区,并沿着海岸往回注入淡水,从而解决了海水入侵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无疑深化了人们对不同利益的个体如何共同合作来保护公共资源的认识。

1965 年,奥斯特罗姆在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印第安纳大学,不久就获得了长期教职岗位。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第一个项目是考察城市警察服务。根据当时流行的假设,城市的警察服务存在规模效应,一个大一统的部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更有效率。奥斯特罗姆首先考察了一个大的和三个小的警察部门的绩效,其后扩展到了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两个城市,并且对美国 80 个大都市的警察部门进行了比较。这项研究历时 15 年之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奥斯特罗姆的研究结论是,当时流行的假设,即规模效应的假设和小型警察部门之间在协调方面不够灵活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事实上,警察服务在很多方面不存在规模效应,多中心制度安排的表现要优于大一统的警察部门。

在对警察服务的研究过程中,奥斯特罗姆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综合理论模型、官方记录和创造性的实地考察是其深入研究资源管理问题的主要方法。她坚信: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应该引入并应用到政治学中。

1973 年,奥斯特罗姆夫妇创办了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该研究所后来成了奥斯特罗姆和其同事协调长期政策项目研究的中心,同时也为有志于跨学科研究的博士后和研究生以及本科生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并吸引了许多访问学者。1981 年,奥斯特罗姆夫妇访问了德国比勒费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从此,她创建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登上了国际舞台。1988 年,奥斯特罗姆受博弈论专家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泽尔滕之邀,再次访问比勒费尔德,这次访问为其后来的开创性贡献奠定了基础。1990 年,奥斯特罗姆完成了其集大成之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该书再次质疑了私有化和政府控制是管理公共资源最佳方式的传统观点。其后,奥斯特罗姆更加详细

地考察了公共资源的具体类型。她同尼泊尔的同事一起合作,建立了有关灌溉系统的大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并且证明了由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要优于政府管理的灌溉系统。1992年,应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邀请,奥斯特罗姆开始研究森林资源,并为这方面的研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奥斯特罗姆有关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丰硕,著作十余本,重要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最重要的著作有《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1990)、《自主治理灌溉系统的行业制度》(1992)、《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1993)、《规则、博弈与公共资源》(1994)。其中,《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是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现已成为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

奥斯特罗姆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许多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为她带来了许多荣誉。1991年,她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96年获得美国政策研究组织颁发的杰出妇女奖,1997年获得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塞德曼(Frank E. Seidman)政治经济学大奖,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的詹姆士·麦迪逊奖和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200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博士的称号。

(二)威廉姆森的生平及主要著作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

威廉姆森1932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苏必利尔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因此,威廉姆森从小就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

1955年,威廉姆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学士学位后,成了美国政府的一名项目工程师。这使他有近机会近距离观察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并充分了解科层制组织的运作方式。这份工作还使他有近机会去世界各地进行访问,这为他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58年,威廉姆森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选修了大量的经济学理论课程。

1960年,威廉姆森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然后到卡内基工程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开始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中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生涯。在卡内基学院就读期间,他得到了诸如赫伯特·西蒙、理查德·西厄特和阿伦·梅尔泽等名师的指导。1963年,威廉姆森获得了卡内基—德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产业组织研究和教学工作。1965年夏天,当他致力于研究如何评价厂商规模问题时,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与阿尔钦、贝克尔、德姆塞茨等一批对产权经济学有浓厚兴趣的学者相聚了,并开始对产权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66年9月,他再次从事实际工作,去华盛顿担任反托拉斯部长特别助理一职。在反托拉斯部工作期间,他与该部评价处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聘来的一批十分出色的年轻律师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法学。这11个月的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机会经手处理一系列重要的反托拉斯案子,也深入地了解了企业兼并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这些经验为他日后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所必需。

1970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需要开设一门组织理论课程,这件事成了他转向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企业边界治理研究的直接原因。当他重返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实施公共政策分析哲学博士计划而开设组织理论课程时,终于有了崭新的眼界,并且转向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1977年,威廉姆森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时,密切注意法学界关于合同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发表了他自己的重要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管理》。

威廉姆森在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著述丰硕。最重要的著作有:《自由裁量行为经济学》

(1964)、《公司控制与企业行为》(1970)、《市场与层级制》(197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治理机制》(1996)等。目前,威廉姆森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关于企业、市场、各种中间混合组织和公共机构的经济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公共政策和企业战略应用方面。威廉姆森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于1983年受聘出任耶鲁大学组织与管理学院院长。该学院是法学、组织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和教学机构。威廉姆森也获得了许多学术荣誉:1977年成为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当选为1977~1978年度古根海姆研究院(Guggenheim Fellow)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获得迈阿密大学法学和经济学杰出学者奖,1988年被美国管理学会授予欧文奖,而且先后被挪威经济和商业管理学院、土库尔经济和商业管理学院、圣彼得堡大学、智利大学等授予经济学荣誉博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9年获得约翰·冯·诺依曼奖,2002年被国际商业研究院评为杰出学者,2002年被《经济行为和组织杂志》聘为荣誉编辑,2004年获得 Horst Claus Recktenwald 经济学奖。

三、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对经济治理理论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公告中称,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贡献促使经济治理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奥斯特罗姆提供了使用者协会治理公共资源的规则和执行机制的相关证据,而威廉姆森则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交易发生在企业内部而非市场之中。他们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非市场制度的理解。本节主要介绍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和威廉姆森的企业治理理论。

(一)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经济治理之道

怎样才能对许多个体公用的自然资源实行最佳治理,很久以来一直是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争论的一个焦点。传统观点认为,公共资源通常都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私有化或者交政府管理。奥斯特罗姆对公共资源管理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思想。奥斯特罗姆有关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的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她1990年出版的著名的公共政策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方法极有特色。她着眼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她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人类解决公共选择悲剧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而言,该书第一章反思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首先描述了三个经常用来为政府或市场解决方案提供根据的模型,即公地悲剧(Hardin,1968)、囚徒困境(Dawes,1973和1975)以及集体行动逻辑(Olson,1965)。而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依赖市场,就是依赖政府。紧接着,奥斯特罗姆指出,当前解决公共事物问题不是以政府(利维坦)为唯一途径,就是以市场为唯一途径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她对这三个模型提出了一些理论和经验上的替代选择,具体说明了在国家与市场之外存在的各种解决方案。最后,奥斯特罗姆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解释了不同社群如何形成不同的公共资源治理方法这个问题。

在该书以后的章节里,奥斯特罗姆通过理论与案例的结合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发展了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理论。这种自治理论的中心内容就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奥斯特罗姆,2000)。奥斯特罗姆通过实证研究和隐含的博弈结构分析,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主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影响理性个体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量,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以及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下面详细介绍自治理论这三方面的核心内容。

第一,影响个体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量。在传统上用来为政府或市场解决方案提供根据的模型中,集体选择困境主要源于两个假设前提:一是个体之间存在沟通困难或者根本无法沟通,二是个体没有改变规则的能力。奥斯特罗姆认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当很多独立行动的个体有着很高

的贴现率,且个体之间几乎不存在互信、无法进行沟通或者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以及没有办法制订监督和执行机制来避免过度投资及过度使用时,这些前提假设才能成立,这与现实中个体进行策略选择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为此,她把复杂的不确定环境下影响个体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确定为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四个内部变量。个体的策略选择会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并产生结果,从而影响行动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个体所具有的内在规范受到特定环境中其他人的共有规范的影响,如果个体的内在规范成为与他人共享的规范,那么采取被其他人认为是错误的行动所要受到的社会非议便会对个体形成制约;而贴现率受到个体受自然和经济保障程度的影响。

第二,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要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自治治理的组织必须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三个问题,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制度供给是指由谁来设计自治组织的制度,或者说什么人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建立组织。奥斯特罗姆认为,这取决于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而要评价一套制度的总收益,需要确定九个环境变量:占用者人数、公共资源规模、资源单位在时空上的冲突性、公共资源的现有条件、资源单位的市场条件、冲突的数量和类型、这些变量资料的可获得性、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奥斯特罗姆认为,要了解一套规则制度可能产生的收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取决于当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并对人们公开的信息的类型以及替代方案所提出的制度规则。

在解决了制度供给之后,自治组织还面临可信承诺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复杂的不确定环境下的个体通常会采取权变策略。在自治组织初创阶段,在大多数人同意遵循所提出的规则的情况下,个体在对他的未来预期收益流量进行计算以后,可能会同意遵守这套规则。但在这以后,当违反这条或那条规则所得到的收益大于遵守规则所得到的收益时,他也有可能违反规则,除非这种行为被人觉察并受到制裁。因此,遵守规则的权变承诺只有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可信的,自治组织必须有适当的监督和制裁,它的成员必须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激励自己去监督其他成员的活动、实施制裁,这样才能保证规则得到遵守。

没有监督,不可能有可信承诺,因此自治组织还面临相互监督的问题。基于对自治治理成功案例的研究,奥斯特罗姆认为,许多自治组织自主设计的治理规则本身既增强了组织成员进行相互监督的积极性,又使监督成本变得很低。监督成了自治组织实施规则、进行自治治理的副产品,因为它需要付出太多的额外成本。所有这些都促进自主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而相互监督的加强又能提高组织成员采取权变承诺的可能性,提升组织成员规则承诺的可信度。

第三,自治治理的具体原则。奥斯特罗姆在书中分析了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等公共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自治治理的八项具体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必须明确规定公共资源本身的边界以及有权从公共资源提取一定资源的个体或家庭;(2)制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或(和)资源单位数量的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力、物资或(和)资金的供应规则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体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4)监督。积极检查公共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应该是对占用者负责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5)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两者的分级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程度。(6)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7)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8)分权制企业。由多层级的分权制企业来组织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

奥斯特罗姆所提出的自治治理理论,为人类解决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正是奥斯特罗姆冲破了公共事物只能由政府管理的唯一性教条,打破了政府既是公共事物的安排者又是提供者的传统,提出了公共事物管理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机制的新观点。在她以后的研究中,奥斯特罗姆对自己的自治治理理论进行了一般化,提出了多中心理论和制度理性选择框架,并且形成了所谓的公共管理印第安纳学派或制度分析学派。

(二) 威廉姆森:企业边界的经济治理分析

企业为什么会存在?是什么因素决定企业的规模?在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为什么即存在长期合同关系,又存在纵向一体化现象?这些都是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所要回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相互替代的机制或安排,交易费用是决定企业取代市场的重要因素。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为完成交易所必需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制裁违约行为,以及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市场交易费用很高的资源配置过程,有可能不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企业之间的一体化来完成。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从而实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这就是企业存在的客观必要性。换言之,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即以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来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应该位于企业内部交易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内部交易边际费用那一点上;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订立长期合同还是实行纵向一体化,这应该取决于两种组织形式的交易费用比较结果。

科斯有关交易费用的思想是威廉姆森研究企业治理的主要思想源泉。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概念进行了一般化,使之成为正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使交易费用分析方法成了可通用的标准经济学分析方法。威廉姆森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源泉是阿罗在1969年发表的《经济活动组织:关于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之间选择的争论》中提出的思想。阿罗在这篇论文中回答了在市场失灵时取而代之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威廉姆森在科斯和阿罗的思想基础上开创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他认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展了以往的理论观点:(1)资产专用性可以有很多形式,人力资产专用性只是其中的一种;(2)资产专用性不仅会引发复杂的事前激励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复杂的事后治理结构反应;(3)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产业、劳动力、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家庭组织、比较体制甚至金融)都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威廉姆森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节约交易费用。威廉姆森沿着科斯开创的思路,把交易费用的定义扩展到所有市场经济组织的范畴,将交易费用抽象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并认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效果是节约交易费用。他引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重要的行为假设,强调了小数目条件(small-number condition)的重要性,将交易费用细分为事前费用与事后费用。实际上,威廉姆森是在使交易费用概念具有可操作性。譬如,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效率边界问题。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企业组织的出现与存在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但却会导致企业内部的协调与管理费用。这部分的费用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产生了企业规模选择问题。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样,当追加交易由企业来组织时,企业就会变大,当企业放弃对这些交易的组织时,企业就会变小。企业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追加交易的费用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费用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费用为止。也就是说,当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规模来内化一笔市场交易所节省的交易费用等于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所增加的管理费用时,企业就会失去扩大规模的动因,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也就由此而确定。威廉姆森指出,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联合决策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有时会同时产生作用。但是,如果节约交易费用确实是主导因素的话,那么,其他因素就成了配角。威廉姆森对市场与企业内部组织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各有长短:市场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占有优势,而企业内部组织则在对付机会主义行为上表现出更强的应变能力。于是,交易活动由市场机制或企业组织哪种方式来协调更加有效,就取决于实施这两种协调方式的费用,即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部的协调费用孰高孰低。企业的效率边界或适度规模的均衡条件是:建立企业所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部的协调费用相等。威廉姆森认为,企业的边界还受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只要这两大因素还存在,企业就会存在;这两大因素的影响越大,企业的边界就越长;如果这两大因素无限扩大,那么,企业组织甚至可以存在于整个社会层面。

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这三个维度来描绘交易的特性及其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并且认为资产专用性的作用最为重要。因此,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可以概括为:在分析交易的特征之后,从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能力方面去探讨可采取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认为,大量的理论分支摒弃了从生产函数角度研究厂商的做法,而改用从治理结构角度来研究厂商的方法。一方面,厂商边界的确定不再基于技术的考虑,而是出于比较交易费用的考虑;另一方面,边际分析让位于离散的结构分析。而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来分析交易与组织的特性。因此,他明确指出,交易费用理论是基于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主要致力于研究各种类型交易的治理结构。产权理论主要研究制度环境或博弈规则,而交易费用理论则是研究具体的治理制度(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或者具体的博弈过程(the play of the game)。

威廉姆森从交易费用到企业治理结构的逻辑可以简单表述为: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提高了交易费用,不确定性的存在影响了交易契约的执行,小数目条件加重了交易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因此,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就会更多地诱发机会主义行为。专用性资产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专用性资产价值越大,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因为厂商越有可能受到其交易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伤害。只要交易伙伴不再与厂商保持交易关系,或者中断交易关系,就可以使厂商的专用性资产蒙受重大损失。因此,必须采用某种治理模式来提高交易效率。

威廉姆森把每一种经济制度都还原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在合同签订之前是交易,而在合同签订之后就是治理。他强调指出,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关注对合约关系的治理,但治理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各种备择治理模式的比较绩效,不仅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也随着经济行为主体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威廉姆森提出了一个三层次模型(three-level schema)(参见图1)。

在威廉姆森看来,制度环境决定游戏规则,他把制度环境的变化看作是变动参数。例如,产权、合同法、规范、习俗等的变化会导致治理的比较费用发生变化。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市场、混合组织和层级制组织的比较费用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经济组织的重建。关于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假设,使得治理必须事先创建保障机制(可信的承诺)以减弱经济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且,组织有自己的生命,如同法律一样(如图1中的环形箭头所示),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组织。英明的君主会寻求既做出又得到“可信的承诺”,而不是用机会主义来对付机会主义。换句话说,可以重新安排激励机制,或者重新设计较好的组织交易治理结构。因此,按照这一框架,治理这一分析对象既为更客观的特征(制度环境)所包容,也为更微观的特征(个体)所包容。

威廉姆森强调指出,任何治理模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例如,市场这种治理模式具有较高水平的激励强度,但却容易导致事后的不适应;而企业这种治理模式则能够降低事后不适应程度,但只有较低水平的激励强度,并且容易发生科层管理。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当存在各种不同的交易模式时,交易各方必须选择总费用(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最小的治理模式。因此,在纵向一体化问题上,威廉姆森强调必须对内部组织的限度和力量做出评估。同时,威廉姆森还强调,在从交易费用角度理解治理时不应该排斥其他理论。正如他所言,如果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那么应该根据企业(与市场相比)提供有用的组织功能的能力来设定企业的边界。因此,企业组织理论必须与企业技术理论“并肩合作”。

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特定的交易要用特定的治理结构来组织以节约费用,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替代最终取决于交易与治理结构的匹配。由于威廉姆森开创的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企业边界、纵向一体化、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等领域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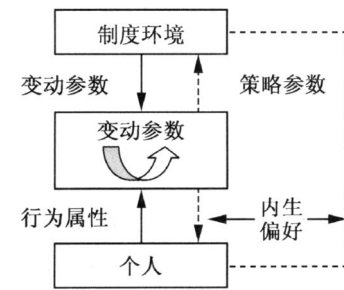


图1 交易费用经济学发挥作用的三层次模型

因此也直接推动了主要由 Hart 和 Moore 等提出的不完全合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威廉姆森通过把组织理论与经济学结合起来,促进了组织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样地,法律与经济学的结合也促进了法经济学的发展。

四、治理经济学的实践价值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获奖,可以说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再次肯定。科斯提出制度经济学理论,诺思和福格尔是用历史证明了这个理论,他们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则全面地发展了这个理论,现在也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两名获奖者在过去的 30 年里所做出的努力表明,经济分析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大多数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使经济治理研究从学术界关注的边缘走到前沿。

(一) 经济治理理论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借鉴意义

经济治理理论为理解和反思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以及为未来制定防范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次贷危机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公司、风险承担行为以及危机应对中的政府角色,都与经济治理理论研究相关。

威廉姆森的理论为理解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倾向于通过肢解大企业来促进市场竞争;而威廉姆森则认为,大型企业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其效率更高,但大企业也存在滥用权力的倾向。管理这些大企业最好的方法不是肢解它们,而是直接监管它们的越权行为。目前,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和威廉姆森的理论相符:奥巴马拟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直接监管各种金融机构。

但是,为了避免危机重演,不断扩大政府权力就是正确的方向?对于这个问题,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思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接管或者私有化并非是最好的运作方式,通常可以采用更加有效的治理方法。

(二) 经济治理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完善的企业治理,而且还应该有完善的政府治理。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和发展,为我国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增加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参考。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其实质就是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进,是在寻找和构建一种更加有效、更能节省交易费用的新的治理结构。

奥斯特罗姆有关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的思想对我国的公共资源管理也有参考价值。公共资源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乡村自治是古代乡村公共资源管理和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源过度开采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公共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如何面对公共资源现状,如何避免我国公共事物的退化,挽救日益枯竭的公共事物乃至公众日益淡薄的公共意识,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以自愿的方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是走出公共资源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她的观点无疑为我们有效管理公共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威廉姆森强调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所能提供的视角不止一个,可分为制度环境方法和治理制度。前者相对来说是一种宏观视角,关注于政治和法律的博弈规则;而后者相对来说是一种微观视角,涉及交易合同与交易组织的企业模式和市场模式。这也就是说,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无论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都有理论参考意义。例如,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已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公司治理结构仍然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企业激励、监管机制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威廉姆森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对于我们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威廉姆森还强调,由于发展与改革极其复杂,因此,从多个视角综合研究这些问题,而不要把目光完全盯住其中的某个问题,这样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很好建议。

注释:

本文把“commons”译为“公共资源”。实际上,奥斯特罗姆称之为“common pool resources”(CPR)。国内有学者把“common pool resources”译为“公共池塘资源”,这可能是一种误解。英文“pool”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池塘,二是放在一起。这里应该是第二层意思才对。

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可参阅其简历以及科学传记作家 Nick Zagorski 为她写的小传《Profile of Elinor Ostrom》和毛寿龙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译本所作的序言。

威廉姆森的生平,可参阅他所著的《治理机制》一书的第一章及其简历以及 Hogson 对威廉姆森的采访“An Interview with Oliver Williamson”[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007,3(3):373-386]。

毛寿龙在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对这些原则进行了总结。

主要参考文献:

-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陈旭东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0.
- [2]奥利弗·E. 威廉姆森. 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同和策略行为[M]. (张群群,黄涛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 [3]奥利弗·E. 威廉姆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 (段毅才,王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4]奥利弗·E. 威廉姆森. 治理机制[M]. (王健,方世建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5]吴宣恭等. 产权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 [6]高轩,神克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12.
- [7]张鑫.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评述[J]. 改革与战略,2008,(10):24-32.
- [8]Ostrom,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 [9]Ostrom,Elinor. Crafting institutions for self-governing irrigation systems[R].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1992.
- [10]Ostrom, E,Schroeder,L, and Wynne,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M]. Boulder,CO: Westview Press,1993.
- [11]Ostrom, E,Walker J, and Gardner,R. Rules,games,and common pool resource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 [12]Ostrom,E, et al. Revisiting the commons:Local lessons[J]. Global Challenges,1999,284(2):278-282.
- [13]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Economic governance[EB/OL]. The Prize in Economics Science,2009.
- [14]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organization of cooperation[EB/OL].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2009.
- [15]Williamson,O. The economics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 Managerial objectives in a theory of the firm[M]. 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 Press,1964.
- [16]Williamson,O. Corporate control and business behavior: An i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 form on enterprise behavior[M]. 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1970.
- [17]Williamson,O.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1,61(2):112-123.
- [18]Williamson,O.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1975.
- [19]Williamson,O. Franchise bidding for natural monopolies - In general and with respect to CATV[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7(1):73-104.
- [20]Williamson,O.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2):233-261.
- [21]Williamson,O.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New York: Free Press,1985.
- [22]Williamson,O. The logic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J].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8,4(1):65-93.
- [23]Williamson,O. Economic institutions:Spontaneous and intentional governance[J].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91a,7(S.I.):159-187.
- [24]Williamson,O.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1b,36(2):269-296.
- [25]Williamson,O, and Masten,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Vols. I and II)[M]. Aldershot, U K: Elgar,1995.
- [26]Williamson,O.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 [27]Williamson,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choice to contrac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3):171-195.

(责任编辑:谷化)